

苏轼诗文选

闫晓东 注析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诗文选/闫晓东注析.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7.1

ISBN 7-5442-3566-1

I .苏... II .闫...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
—中国—北宋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I214.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8951 号

SUSHI SHI WENXUAN

苏轼诗文选

注 析 闫晓东

责任编辑 聂 敏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出版)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元月第 1 版 2007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3566-1

定 价 33.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中国文学经典 第一辑)·总序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漫漫长河中,倘若没有《诗经》、《左传》、《楚辞》、《史记》……,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没有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我们的世界将会怎么样?

当然,在纷纷攘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知识经济风起云涌的喧嚣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定会让人觉得迂腐而且好笑!然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如果没有《诗经》的质朴、楚辞的奇丽、唐诗文的博大与璀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元曲的本色与衰飒、明清散文和小说的灵动与典实,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少几分美丽,多几分寂寥;少几许意趣,多几分枯燥!不是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了中国文学的滋润,我们离别的美酒更加香醇,相思的春潮更加澎湃,儿童的心灵更加澄澈,男儿豪情万丈,女儿柔情万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还有多少男儿具有这样的侠肝义胆?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需要经典,是因为我们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

有关古诗文的注疏自古汗牛充栋、各领风骚,在出版资源有限的今日中国,大规模组织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专家教授新编“中国文学经典”(第一辑以古诗文注疏为主,今后还将陆续出版以古典文学名著评价为主的第二辑,以现当代诗文赏析为主的第三辑,以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为主的第四辑……),又请来书界泰斗启功先生为丛书题签。那么,我们这套“中国文学经典”丛书到底有哪些方面的特色呢?

其一,在作品的选择上我们坚持了时间上的大跨越和体裁上的兼收并蓄。“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第一辑)包括诗经、楚辞、史记、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六朝诗文、唐宋八大家文、李白、杜甫、李商隐、苏轼及历代词赋和元曲、明清诗文小说等经典。其中既有聂石樵、韩兆琦、李道英等资深教授诠释经典著作的最新修订本,也有李山、周月亮、鲁宝玉等中青年新锐的呕心沥血之作。所收文学体裁涵盖诗歌、词曲、辞赋、散文、小说、传记,上下五千年,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其二,作者力求使原有诗文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得以尽量客观地再现,在注释与诗文赏析时,力求与原文及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相吻合,而非“望文生义”、“隔靴挠痒”式的诠释。

其三,作者并不满足于泛泛的诗文赏析,也不满足于对诗文思想内容、艺

术特点的简单概括,而是从音韵、修辞、用典、意象、境界等方面对诗文进行具体阐释,以求展现每首(篇)诗文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如此,作者还力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深入到诗文所描绘的具体环境中去,力求与古人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在心灵交汇中达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视界融合”。

其四,加强了诗文所属类别、产生年代、诗人背景资料等方面的知识性。文化现象从属于社会历史现象,研究、了解诗文离不开研究、了解诗人和诗人、诗歌所产生的那个社会年代。将相关资料编入书中,一方面有助于引导读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将诗文放在当时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理解,真正读懂、读透。另一方面,读者也可通过诗文阅读,更透彻地了解作品产生年代的文化、民俗、宗教等,有效地补充了历史典籍记载之不足。

其五,丛书力求兼顾作者自身研究的独创性与现有学术成果的继承性、教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文学欣赏的高雅性。在尊重、继承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力求采用更为合理的观点和说法予以解释和分析,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注释部分力求准确、切要,赏析部分力求篇幅匀称,文笔优美,追求较强的可读性。

其六,诗文入选范围广、跨度大。所选诗文既有历朝历代家传户诵的脍炙人口之作,也有历来公认为佳篇名作而一般选本鲜有选入者,还有少数是作者认为在某些方面独具特色、值得流传后人的。

总之,全套丛书力求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高雅性与趣味性,使之既适合作为高等院校中文系、历史系博士、硕士研究生、本、专科学生教材,同时对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文学爱好者和中学师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诗词是心灵的花朵,散文是心田的绿阴。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高校师生和读者能和我们一起去领略美妙的诗情文境。一次阐释就是一次超越古今时空的心灵交汇。但另一方面,一次阐释何尝不是一次险象环生的“导读历险”!更何况学海无涯,历代名家佳作如林,不能尽选;历来评说太多,无法尽收。加之编写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故选篇未必精当,难免遗珠之恨;赏析未必完备,难免挂一漏万。疏陋舛讹、偏颇失误之处,祈望读者明鉴、方家斧正、同仁赐教!

“中国文学经典”丛书编委会
甲申年末于北京师范大学

自序

在中国古典文化的长廊中,苏轼无疑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学家之一。作为北宋一代文化的优秀代表,苏轼达到了一个古代文人文化创造的巅峰:他具有悯时伤世的济物情怀,舒卷自如的人生智慧,高卓超凡的文学才能和雅俗共赏的人格魅力。在政治上,他关心民瘼,兴利除弊,指陈朝政,毫无顾忌,体现了士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学上,他继承欧阳修文坛领袖的地位,翕然一呼,天下响应,“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李廌《师友谈记》)。虽然在政治上因陷入党争之中而屡遭贬谪,颠沛流离,却依然保持着坦荡率真的高尚人格。正如宋孝宗所说:“不可夺者峬然之节,莫之制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东坡集》序)在时光吹散当年的政治烟尘之后,苏轼终以其丰厚、纯粹的文人本色卓立于世,为千百年来的人们所钦慕和怀想。

—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人。他出身于诗书传家的文士家庭。在父亲苏洵的悉心教导下,年轻的苏轼“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但也正是作为父亲的苏洵,最为了解苏轼的弱点,他在苏轼、苏辙幼年时所作的《名二子说》中早已预感到:“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轼”是指古代车子前端的横木,可供依凭瞻望,故苏轼字子瞻。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轴,对车来说都有自己的作用,唯独车前的横木好像没什么用。即使这样,没有了横木,车也是不完整的。苏轼啊,我恐怕你不会修饰你自己啊!”)这句话不幸言中了苏轼坎坷多难的一生。苏轼的宦海浮沉与北宋中后期激烈的党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有过辉煌的顶点,但终其一生,却不得不在难以预料的政治旋涡中不断挣扎。在这里,我们把苏轼四十年的仕宦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嘉祐治平时期(1056~1067)。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风华正茂的苏轼与弟苏辙第一次随父亲走出了巴山蜀水,赴京应举。人文荟萃的京师为初出茅庐的苏轼提供了一个尽情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嘉祐二年(1057),苏轼与苏辙同科及第,与他们同时登第的有曾巩、程颢等未来的著名文人学者,还有后

来在政坛上与苏轼纠缠不清的吕惠卿、章惇、朱光庭等人，故时人称嘉祐二年（1057）这一榜为“龙虎榜”。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其蹈厉风发、雄辩滔滔的风格征服了主考官——一代文坛宗师欧阳修。爱才心切的欧阳修不禁惊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时父苏洵、弟苏辙也受到欧阳修的激赏。父子三人，一时名动京师。嘉祐六年（1061），二十五岁的苏轼与父、弟再至汴京，应制科考试。在对策中，苏轼针对当时政治、军事、财政上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提出了许多激进的改革建议。宋仁宗惊喜于苏氏兄弟的出色才华，亲口赞许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苏轼也在这次对策时被评为三等。有宋以来，获三等者不过苏轼与吴育二人而已。制科考试之后，苏轼被授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从此踏上看起来将是一帆风顺、光明灿烂的仕途。三年任满后，苏轼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后因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乃扶丧归里。

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初，苏轼丁忧期满后，回京任职判官告院。此前，年富力强的宋神宗即位，重用一代名儒王安石，大力推行旨在富国强兵的新法。但是，新法的推行受到韩琦、欧阳修、司马光、富弼等许多朝廷重臣的反对。苏轼也多次上书神宗，对变法提出批评意见。在新党的仇视和排挤下，苏轼为了远身避祸，不得不于熙宁四年（1071）请求外调，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通判或知州等地方职务。他在地方上一方面革新除弊，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颇有政绩；另一方面与当地高僧名士交游，读书吟诗，优游于山林之下。但是随着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被罢相，本为兴利除弊的变法逐渐演变成为赤裸裸的权利争夺。苏轼虽然远离京城政治的风暴中心，仍然未能摆脱政治迫害。元丰二年（1079），正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因在诗文中讽刺朝廷的新法，遭言官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弹劾，认为其“包藏祸心”、“指斥乘舆”。苏轼被御史台逮捕下狱，备受诟辱，几置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后虽经太后及王安石等人的多方营救，苏轼才得以侥幸出狱，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以戴罪之身流放黄州。“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是巨大的。在黄州期间，他闭门思过，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对佛老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此来解脱内心中深重的苦闷。正是在黄州数年孜孜不倦的思考和艰苦的生活，使苏轼的人生更加厚重，思想更加通达，文章更加成熟。前后《赤壁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都作于此时。

元祐时期（1086~1093）。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纷纷攘攘的党争中，壮志未酬的神宗去世了。年幼的哲宗继位，一向对旧党持同情态度的高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重臣司马光等人重新掌握政权，变法大业随之中止，史称“元

祐更化”。这一时期，苏轼也被召入京担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是，由于司马光等旧党领袖力主将新法全部废除，而苏轼反对这种武断粗暴的做法，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遂又与执政者发生分歧。司马光去世之后，这一政治上的分歧逐渐扩大成为学术之争，并最终演变成为旧党内部的洛蜀党争。以著名理学家程颐为首的洛党，不断攻击在他们看来“习为战国纵横之学”的蜀党人士，斗争的矛头却都指向苏轼。在政敌的不断攻击甚至诬告之下，苏轼不得不再次自请外任。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元祐六年短暂召回之后，又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这一时期，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不断的打击，但是文名愈著，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坛领袖。他也利用这一机会，有意识地效法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不断地发现人才、拔擢人才，并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给予切实的指导。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学识卓著、文采风流的诗人和学者。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门人，以其优秀的创作实绩使北宋后期的文学景观更加丰富多彩，对一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绍圣时期（1094~1098）。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掌权达八年之久的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年轻的哲宗早已对口口声声以儒家学说对其行为进行匡正的旧党人士心生反感，于是借此机会，以继承神宗变法大业为号召，再次重用新党，贬斥元祐旧臣。重新掌握政权之后的新党已经纯粹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报复旧党在元祐时期的打击，新党对旧党人士进行了变本加厉的政治迫害。新党通过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将攻击新党和新法的奏章记录在案，再依次对上言者定罪。许多在元祐时期当政的重要大臣，都被贬到落后僻远、生活艰苦的岭南地区。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则被追贬和削夺恩封，甚至险遭掘墓之祸。作为元祐党人重要人物的苏轼，又一次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先是被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被流放到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在海南，苏轼“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生活极端困苦。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卒于常州，结束了他颠沛流离而又多姿多彩的一生。

二

早在少年时期，苏轼读《汉书》的时候，就感慨于东汉士人范滂的事迹，“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登上仕途后，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正是因为有着如此之高的政治期许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年轻时期的苏轼立朝便以敢于论谏著称，上书言事，每每“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在早期所作策论和上神宗皇帝的奏章中，他大胆揭露时弊，多次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虽然后来由于党争激烈，苏轼的政治抱负并未完全实现，但在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之时，始终秉承着“造福一方”的宗旨，兢兢业业，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他一生“八历名郡”，从富庶江南的杭州到东海一隅的密州，从捍御北边的定州再到海外孤岛上的儋州，无不留下了苏轼勤政爱民的身影。他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在密州率众抗洪救城，在定州筹措安边之策，直到远贬南荒仍然念念不忘以救济民众为事。可以说，苏轼每至一地，都作出了卓著的政绩，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所以，当他在元祐时期，重返杭州任知州的时候，“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尤其值得钦佩的是，虽然苏轼在政治上屡遭打击，一生困顿，然其报国之志始终未衰。贬黄州后，他曾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岂敢负所付，捐躯欲投会”（《闻子由为郡僚所掇，恐当去官》），依然坚持着少年时期“以天下为任”的远大理想。甚至直到晚年，他还“许国心犹在”（《南康望湖亭》），在其自海南放还路过岭南大庾岭的时候，仍然自许具有那种堂堂正正、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这是苏轼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最终确认。

就苏轼个人而言，他固然不缺乏纵横文字的绝世才华，不缺乏精敏善断的行政才能，但是，在政治上他性格的弱点却是无法回避的。他深爱的侍妾朝云曾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与他情兼师友的黄庭坚则说他“短处在好骂”，其实正指出了苏轼之所以在政治上屡遭打击的部分原因。苏轼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多次指出自己“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一文中，他说得更为形象：“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肺腑。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苏轼的这些话，无论是否有文人潜藏的清高自诩之意，却实际上道明了其所遭到的一些磨难的原因。苏轼一生聪明，见事通透，言语犀利，滑稽善谑，行文畅达，而且为人真率，这是其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其文学的魅力所在，但是却成为其政治上的阿喀琉斯之踵。苏轼人格中的光辉处在此，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失败也在于此。当然，在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下，失败的不仅仅是一个苏轼，而是一个曾经辉煌的王朝。

苏轼毕竟是文人，即便是一个不乏政治才能的文人，折冲于尊俎之间，奔波于四方之地，虚与委蛇、拉帮结派的官场生活也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所乐见

的。早在他刚刚步入仕途时,他便发出“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和“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的牢骚。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他对这样的生活更是充满了厌倦:“古来人事尽如此,反复纵横安可知”(《昭君村》)、“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送安淳秀才失解西归》)。而在经历了长期的贬谪生活之后,苏轼愈发难以摆脱这一心灵上的枷锁。在黄州时,他在死里逃生之余,痛自咎悔,言语行事都小心谨慎,在与挚友的信中,他说道“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袞袞多言矣”(《答秦太虚书》)、“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与滕达道书》)。在这种惊弓之鸟般的状态中,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孤寂。他在《送沈逵赴广南》中写道:“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而当他以老病之身,远谪海南的时候,他甚至以为将葬身于孤岛之上:“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到昌化军谢表》)这是怎样一种深重的痛苦与绝望啊!

如果苏轼始终沉溺于这种痛苦与绝望之中的话,那么他就和历代情感脆弱的小文人一样,无足挂齿了。正如苏轼弟子秦观所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答傅彬老简》)苏轼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终于从这种痛苦与绝望中摆脱出来,从内心的生命体验中逐渐深悟“性命自得”之道,形成了舒卷自如的人生智慧,而这又不得不提及苏轼的佛学修养。

苏轼的空门友惠洪曾经言其“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读东坡居士南迁诗》),极为推崇其佛学修养。苏轼阅读佛书之始是在凤翔,而真正“归诚佛僧”则是在黄州。他在《黄州安国寺记》里描述自己奉佛之心:“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所谓“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正是苏轼悟得的佛学真谛与解脱法门。苏轼的超拔脱俗,不为物缠,不为法缠,也正在于其活泼廓大的心性与佛学万法性空之说的巧合妙契。

苏轼本是一个豁达开朗、天机流动之人,胸中自有万里山川,天容海色,不易为琐屑之物挂怀。而了悟之后,更是参透此身的虚幻不实与万物的空洞无物。于是,他经常在诗文中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喟:

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园山水聊心存。(《次韵滕大夫三首·雪浪石》)

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二首》之一)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如娇·赤壁怀古》)

《金刚经》曾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从般若正智看来，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幻一样虚妄不实的。而苏轼则将人脆弱的生命看做虚幻，将奔波忙碌的一生看做虚幻，从而使人生以一种相对的形式存在着，它不再是我们为之奋斗和追求的目的，它的绝对价值被以梦的形式消解了。正因为人生如梦，苏轼才更凸显了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感。在其少年时期所作的《和子由〈澠池怀旧〉》诗中，苏轼就曾经道出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千古名喻。这是对人生偶然性和相对性的精妙概括。而在初到黄州之时，苏轼更是认为“万事如花不可期”（《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所作》），因此，作为一个在天地之中无所寄托的个人，自然也去来无定：“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泗州僧伽塔》）。而关键之处，就在于“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百步洪二首》之一）。所谓“心无所住”，就是“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宝绘堂记》）。苏轼指出：“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留意于物”指的就是对外物的偏执，而“寓意于物”则是“游于物之外”，对外物无可无不可、无得无不得的态度，只有秉持这种态度，才能“无所住而不乐”（《超然台记》）。因为无执著之心，所以内心的负担才会随时放下。关于这一点，苏轼在惠州所作的《记游松风亭》中说得最为真切：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何处不是歇得处？何时不是歇得时？执著于某时某地方才歇得，其实正如“挂钩之鱼”，反多牵累。所以苏轼在面对老病衰惫之身、瘴疠偏远之地、孤苦惨淡之境等诸般苦难的时候，都能求得心灵的宁静和祥和。他初到黄州，便觉“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到惠州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这又是怎样一种豁达开朗的胸怀！

尤其值得珍视的是，苏轼在归诚佛僧、破除妄念的同时，仍然坚持着一份可贵的淑世情怀，在梦中追求人生的至味与真味。在《豆粥》一诗中，他嘲笑戎马倥偬的帝王刘秀和家拥万金的豪富石崇：“干戈未解身如寄，声色相缠心已醉。身心颠倒不自知，更识人间有真味。”而人间的真味是什么呢？就是“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粳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的农家生活。在黄州的时候，他与朋友出郊寻春，往昔之事宛如梦幻，而朋友之间的深厚感情则是温暖而永恒的：“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

同去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苏轼曾经说过自己“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自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蓼花洲闲录》)。他深悟“一切众生皆平等”的道理，既能够在朝堂之上与皇帝、重臣从容论道，也能够与贩夫走卒之辈于荒郊野店之中纵意歌呼。无论在哪里，他都能找到相与晤谈的朋友。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谑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后去。或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在他诗文中出现的那么多辛苦劳作的普通人，有农民，有酒贩，有乡间医生，有无业游民，可见其交游之广。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这种平易近人的和气，正是苏轼脱略文人酸腐气和世俗气的可贵之处。传说当苏轼在海南之时，常常“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此事或许是“莫须有”之事，然而展现出来的却是苏轼洒脱淡然的大境界，也是参透生命本相的真境界。正因如此，苏轼在北宋受到了许多平民百姓的尊敬与爱戴。宋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甚至当苏轼自海南贬谪归来，“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千万人随观之。坡顾坐客曰：‘莫看杀我否？’”(《清波杂志》卷三)千百年来，犹让人会心一笑。

三

无论是在辉煌的朝堂之上，还是在僻远的贬谪之地，苏轼永远未曾脱略自己真率自然的文人本色。穷达进退，他一如不系之舟，任其流行坎止，始终未曾忘怀的却是读书作文。他曾经自言：“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春渚纪闻》)正是出于这种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他长期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丰富实践之上，苏轼继承和发展了前人一些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命题，在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发展，从而对传统文学理论和艺术审美理想的完善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传统儒家文学理论一般首先提出明道的观念。像苏轼的座师，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就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观念，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虽然在欧阳修那里，“道”已经超越了那种狭隘的儒家伦理之道，而具备了日常应用之道的内涵，以用来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但是在苏轼看来，“道”毕竟更多的是一种终极的价值观念和哲学观念，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它是一种被悬置的指向，没有必要将之强调过甚，否

则就必然会严重损害文学的独立性：“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轼指出“道可致而不可求”，也就是说“莫之求而自至”（《日喻》），“道”必须经过学者的努力之后，自然地显示与得到，而不可以其私智妄断“道”为何物。

在苏轼的文论体系之中，更为重要的是“意”。葛立方《韵语阳秋》载：

东坡在儋耳时，余三从兄讳延之，自江阴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坡尝诲以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

这里所说的“意”，正是创作主体在内心中酝酿，并欲有所表露的思想内涵。它与“道”的不同在于，它是在创作主体内心中自然生发的，不是由外界强行规范的伦理大道，是“有所不能已而作者”，是“杂然有触于中”者（《南行集叙》），因此它是自然的，是活泼灵动的，是强调内心中感悟和体验的。明确“意”之所在，是作文的枢纽。只有在“意”的统摄下，才能游刃有余地选择“散在经、子、史中”的典故材料，组织剪裁成文。那么“意”从何来？苏轼指出：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送参寥师》）

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必须以空、以静。而所谓空、静，其实是苏轼“阅世”与“观身”的一种精神境界。禅宗六祖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正是通过观察世界和体察自身才能掌握人世间的林林总总，谛听自我内心的微末声响。因此，隐藏在这空、静之后的，还有一片潜然而行、体悟众妙的神思。苏轼在《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中说：“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以一含万，也正契此理。在《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一文中，苏轼说得更为明确，他指出：文与可画竹，是“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中，苏轼又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成竹在胸、见竹不见人，都说明在文的内心中已然达到了一种虚静空灵、心与物化、人耶竹耶、难以分辨的契合状态。这应是创作灵感勃发和才情喷薄欲出的前奏。

“意”之明确，内心杂然有触于中，“有所不得已”不过是为文的第一步。

要真正达到作品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还要靠“辞达”。“辞达”之说源自孔子《论语·卫灵公》:“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孔子本意在于说明语言应当有适当的文采,更要准确畅达。但是历代以儒论诗者却往往借用此语反对文章艺术性的追求。像司马光在《答孔文仲司户书》中认为:文辞“足以通意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苏轼重新拈出此语,是对孔子“辞达”说的继承和发展。他指出:“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虔倅俞括奉议书》);又指出:“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在这里至少在三个层面扩展了孔子的观点:其一,将表达的对象由儒家之道扩展为“物之妙理”。这种妙理笼括万象,涵盖山川草木,水月云露,世间有情,体现于每一具体而微的事物之中,寻绎起来,却如“系风捕影”。其二,苏轼将创作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一是对物之妙理了然于心,这就形成了我们上文所说的“意”;二是由心到手,要正确地表达出内心所明了的妙理,“达于口与手”。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畅达明晰地描述和阐发我们所认识和了解的万事万物的“妙理”所在。而这种“达”是超越于技巧之上的,正如苏轼所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其三,展现了“辞达”之后的理想的艺术境界。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称赞谢的作品“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在《文说》一文中又自评其文:“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所谓“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展示的是一种言随心发、心与理契、文理自然、高度自由的艺术境界。苏轼对孔子辞达说的阐发,是在长期创作实践中体悟到的经验之谈,也是苏轼文艺创作理论的核心与枢纽。

苏轼的辞达说,虽然强调的是物之妙理,但是不会像宋代理学家那样,只能以质木无文的文章表达出平白浅直的道理。因之在文章风格上,他特别强调艺术作品一定要有超越文字之外的韵味,要有“得之象外”、“咀嚼有味”的深远之美。他在早年所作的《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中比较王维与吴道子的画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谢笼樊”,认为吴道子乃形似工巧之作,王维则得物妙理,绘出祇园弟子“心如死灰”之情。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苏轼评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并进而提出优秀的诗歌作品在风格上应该“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纤秣”与“简古”,“至

味”与“淡泊”，似乎是非常矛盾的审美概念，苏轼却在这里将之糅合为一，并进而作了更为细致的比较：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腴，渊明、子美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东坡题跋》卷二）

苏轼的这一说法，其实远袭唐末诗人司空图的韵味说，又受到佛理的深刻影响。他曾经感叹说，“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书黄子思诗集后》）。故苏轼引用佛理之说，使其愈发精深。文中所引“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之语，出自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所谓“分别中边”，其实正是了悟文学艺术作品风格的复杂性，以枯与膏、淡与美、纤秾与简古、至味与淡泊，均为相互对立统一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对立概念之间并非只有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完全可以并且应该统一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圆融境界。正是在枯淡中方显出膏美，在简古中方透出纤秾，在淡泊中方体验到至味。而从华美到平和淡泊，需要一个长期的人生历练过程。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说：年轻时候作文应该“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这种艺术风格的平淡，是一种历尽人世风波，看尽人间万象之后的从容与淡定，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生智慧，是一切繁华落尽之后的平和自然，是一种丰富而充实的人格反映。正因为如此，晚年的苏轼对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率真自然的高贵人格，“谈笑过此生”（《和陶渊明〈饮酒〉》）的人生境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歌风格推崇有加，认为“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可以说，陶渊明寄托了苏轼的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也是苏轼异代同契的挚友。两位心灵相通的伟大诗人，宛如两束在无边历史夜幕下闪烁而过的慧星，在瞬间的绚烂之后，为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印记。

闫晓东

2006年11月

目 录

诗 部 分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 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 寄之 (2)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 (21)
和子由《浣池怀旧》 (3)	戏子由 (22)
石鼻城 (4)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23)
鄮 坞 (4)	吉祥寺赏牡丹 (24)
题宝鸡县斯飞阁 (5)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 (选三) (24)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选一) (5)	和欧阳少师寄赵少师次韵 (25)
石鼓歌 (6)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 次韵 (26)
岁晚三首(并序) (9)	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 ... (27)
和子由寒食 (11)	六合寺冲师阊山溪为水轩 ... (28)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 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 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 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 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 (11)	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28)
周公庙(并序) (12)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29)
楼 观 (13)	听贤师琴 (30)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 南溪小酌至晚 (13)	法惠寺横翠阁 (31)
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 ... (14)	饮湖上初晴后雨 (32)
石苍舒醉墨堂 (15)	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 留风水洞见待 (32)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16)	自普照游二庵 (33)
泗州僧伽塔 (17)	新城道中二首 (34)
龟 山 (18)	山村五绝(选三) (35)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 (19)	次韵代留别 (36)
游金山寺 (20)	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选三) (37)
	有美堂暴雨 (38)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 (39)
	陌上花三首(并引) (40)

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 以病先起	(41)	次韵蒋颖叔	(65)
书双竹湛师房二首	(42)	书林逋诗后	(66)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42)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	(67)
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43)	登州海市并序	(68)
和子由·送春	(44)	惠崇《春江晚景》(选一)	(70)
东栏梨花	(45)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 二首	(70)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46)	虢国夫人夜游图	(72)
百步洪并叙(选一)	(47)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选一) ...	(73)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49)	书鄱陵王主簿所画折枝(选一)	(74)
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50)	书皇亲画扇	(75)
狱中寄子由(选一)	(51)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	(75)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聚图》二首	(52)	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	(77)
初到黄州	(53)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78)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 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54)	寄蔡子华	(79)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 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	(56)	寿星院寒碧轩	(80)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 忽记去年是日同去女王城作诗,乃 和前韵	(56)	赠刘景文	(81)
红 梅(选一)	(57)	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选四) ...	(81)
琴 诗	(58)	次韵刘景文见寄	(83)
东 坡	(58)	聚星堂雪并序	(84)
和秦太虚《梅花》	(59)	双 石并序	(85)
海 棠	(60)	雪浪石	(86)
题西林壁	(61)	鹤 叹	(88)
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 野人舍	(61)	壶中九华诗并序	(89)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 为谢,且遗二古铜剑	(62)	慈湖夹阻风(选二)	(90)
豆 粥	(63)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	(91)
金山梦中作	(64)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 盛开	(92)
		荔枝叹	(93)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	(95)
		纵 笔	(96)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 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尚在藤也。	

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	(96)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	(103)
余 米	(98)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4)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		赵昌芍药	(105)
四黎之舍(选二)	(99)	过 岭	(106)
纵笔三首	(100)	自题金山画像	(106)
汲江煎茶	(101)		
儋 耳	(102)		

文 部 分

刑赏忠厚之至论	(110)	宝绘堂记	(161)
谢欧阳内翰书	(112)	问养生	(163)
上梅直讲书	(115)	王元之画像赞	(165)
滟濒堆赋	(117)	日 喻	(167)
上王兵部书	(118)	灵壁张氏园亭记	(169)
南行集叙	(120)	文与可画篋筍谷偃竹记	(172)
魏武帝论	(121)	石氏画苑记	(174)
留侯论	(124)	答言上人	(176)
贾谊论	(127)	书渊明饮酒诗后	(177)
晁错论	(130)	答秦太虚书	(178)
策略一	(132)	答毕仲举书	(182)
教战守策	(135)	方山子传	(184)
喜雨亭记	(138)	书唐氏六家书后	(186)
凌虚台记	(140)	黄鄂之风	(188)
稼 说	(142)	临皋闲题	(190)
亡妻王氏墓志铭	(143)	作伪心劳	(190)
净因院画记	(145)	书清泉寺词	(191)
墨妙亭记	(146)	前怪石供	(192)
祭欧阳文忠公文	(148)	后怪石供	(193)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	(150)	前赤壁赋	(194)
邵茂诚诗集叙	(152)	后赤壁赋	(197)
超然台记	(154)	记承天寺夜游	(199)
李氏山房藏书记	(156)	王定国诗集叙	(200)
跋文与可墨竹	(158)	黄州安国寺记	(202)
李太白碑阴记	(159)	书吴道子画后	(204)